

·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

WUSHI DAO YU RIBEN DE JINDAI HUA ZHUANXING

武士道与日本的近代化转型

唐利国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

武士道与日本的近代化转型

唐利国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士道与日本的近代化转型 / 唐利国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9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ISBN 978-7-303-10984-5

I. ①武… II. ①唐… III. ①武士道—研究②日本—近代史—研究 IV. ①K313.03②K3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83953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l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70 mm × 230 mm

印张: 20

字数: 260千字

版次: 2010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0.00元

策划编辑: 李雪洁 责任编辑: 李雪洁 徐会超

美术编辑: 毛佳 装帧设计: 毛佳

责任校对: 李菡 责任印制: 李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序

多年来，德川氏将军独掌日本军政大权的江户时代（1603—1868）一直备受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成了日本史研究的热门课题。国内外研究者除了多角度地探索江户时代史各种问题之外，探讨日本传统文化形态和近代化成败的远因，是聚焦所在的两大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接连推出，不同的见解杂列纷陈，琳琅满目。

国内外学者如此沉醉于江户时代研究，并非偶然。其原因，可以从不同研究领域的不同角度得到解释。从政治制度史的角度看，江户时代是日本封建社会的最高发展阶段。为江户时代所独有的将军集权、大名分权与天皇至尊、将军至强等双重二元政治结构，既不同于中朝等邻国，也有别于欧美各国而颇具特色。这种并存互动的政治结构，可以解释幕府统治何以能维护两百余年的国内和平，至幕末又何以被联合起来的雄藩打倒，近代天皇制何以成为维新变革唯一的制度选择等历史现象的成因。与此同时，江户时代幕府实行以禁绝天主教为目标的锁国制度，对外基本奉行和平交往方针，属于自古以来日本对大陆扩张与收缩间歇式反复过程中的收缩时期，除了不事声张的琉球征服之外，未对中朝等邻国擅动刀兵。

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看，江户时代是封建经济高度繁荣的烂熟时期。

早在 130 多年前，马克思在著述《资本论》时，曾经深刻指出：江户时代“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为研究欧洲中世纪提供了一幅“真实得多的历史图画”。长期和平稳定的国内环境，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前提条件。两百余年间，在封建领主土地等级所有制基础上，士农工商分工择业。以农民、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劳动群众在生活困苦中发挥聪明才智，促进了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国内陆路、海路交通网络密布日本列岛，金银铜三货等流通手段齐备，消费需求旺盛，迅速形成以大阪、江户和京都等三都为枢纽的全国统一市场。封建自然经济机体在商品货币经济的侵蚀下，不可避免地走向瓦解。在有形无形之中，为经济的转型开辟了道路。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江户时代是日本民族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全面成熟并具有鲜明的日本特色。至今仍被视为日本国粹的竞技角力“大相扑”、各领风骚的茶道流派、戏剧“歌舞伎”，以及至今仍受人喜爱的、继续保持艺术魅力的相声“漫才”、诗歌“俳谐”、大鼓书“净琉璃”、彩色版画“浮世绘”、打油诗“狂言”等，均形成或流行于江户时代。在某种意义上说，江户时代的文化堪称蕴育了日本近现代民族文化的母体。与此同时，江户时代的日本继续从中国和朝鲜大量引进汉文化，涌现了大批汉学造诣深厚、礼敬中国文化的学者，使这一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饶有特色。

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看，江户时代百家争鸣，学派活跃。两百余年间，传统官学朱子学虽然占据主导地位，却不断受到阳明学、圣学、古文辞学、古义学、水户学等儒学分支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而自顾不暇，此消彼长，传统学说在不断分化中变容改貌。新兴学说，如国学、兰学、经世学等方兴未艾。其中，国学力倡排佛斥儒，宣扬尊王论、本土宗教神道，并最终将两者结合成为复古主义的“皇神之道”，为开港后倒幕维新、组建近代天皇制鸣锣开道；兰学运用超越岛国狭隘眼界的国际大视野关注世界风云的变幻，热心倡导发源于欧洲的自然科学实验、实践和实证学风的合理精神，为近代日本社会的观念更新提供了思路；经世学以儒学的入世意识为本，兼取兰学、国学之长，疾呼开国论和海外雄飞论，为明治政府

制定进攻型的近代日本国家发展战略而未雨绸缪。

从社会史角度看，江户时代是日本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过渡时期，具有与明清史研究之于近现代中国相类似的研究价值。江户时代社会结构中的人口、宗族、家庭、社区、职业、社团、街区、村落等要素构成一个丰富多彩的系统；衣食住行、聚散交往、节庆习俗等社会生活，构成了近代日本人生活习惯的风土；就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准则而言，渗透着乡党意识的藩国观念、强调上尊下卑的等级思想等均直接来自江户时代。即使在当今的日本社会，在人际关系准则、进退礼仪和企业文化的团队精神内核中，仍不难找到江户时代的历史烙印。

江户时代紧接着日本近代史的发展阶段，是日本近代化的酝酿时期。弄清楚江户时代的方方面面，即找到了认识和理解近现代日本的一把开门钥匙，掌握了透视近现代日本历史演进来龙去脉的要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学术界对日本近现代史研究之所以尚缺乏深刻性和透彻性，其症结就在这里。因此，克服对江户时代研究的整体不足或火候欠缺的遗憾，是今后日本史研究的共同目标。唐利国博士的《日本近代化转型期的武士道》付梓，再为江户时代研究领域增添了新的研究成果，足值庆贺。

唐博士此书共计四章。第一章主要考察了山鹿素行武士道论的思想基础。作者分析山鹿素行的古学和朱子学的关系，以及武士道论和经学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明确其学问的构成方式，探讨其武士道论所面对的时代课题。通过详细考察山鹿素行武士道论的具体构成，深入分析其武士道论的核心即职分论，尤其是君主职分论和武士职分论的部分，以求明确其武士道论的基本特点。

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以吉田松阴的武士道论述和其实践活动为中心展开分析。第二章以静态分析的方式，考察吉田的学术渊源和知识结构，明确了其学问态度方面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其武士道论的基本构成。第三章以动态分析的方式，探讨了吉田武士道论在实践活动中的展开过程。首先，分析其行动尤其是政治活动，揭示了其政治伦理的基本特质。其次，集中分析了其政治变革思想的形成及其历史局限性；并通过与山鹿素行武士道论进行比较和反思，对吉田武士道论的思想价值进行历史

定位。

终章即第四章主要是分析了吉田松阴武士道论的历史影响，以及近世武士道论在明治维新以后的发展演变，由此而进一步解释了近世日本武士道论的思想史意义。

唐博士认为，目前在国内外学界关于武士道发展系谱的认识，尚未超越新渡户稻造、井上哲次郎等日本学者的研究框架。这一看法，不无道理。的确，新渡户的《武士道》一书曾经风靡欧美世界。在这本通俗读物中，新渡户对日本何以在甲午战争中取得令世界始料未及胜利的精神原因，给予通俗易懂、文字生动的解释。为迎合欧美读者的猎奇心理，使之易于理解日本道德文化，新渡户还大量援引西方文学、历史等方面的例证，强调日本和西方的共同之处。此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再次出乎世界预料地击败俄国，在无形之中扩大了探求武士道的读者群，竟使《武士道》成为世界性的武士道普及读物。

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井上哲次郎则以焕发日本国民“忠君爱国”精神，投入对外侵略战争为己任。在1942年编辑出版的《武士道全书》、《武士道的本质》等著作中，强调“国体的优越”、“对天皇的忠诚”、“日本精神”、“日本之道”等理念。通过凸显日本人在精神、道德文化上的自我认同，为“大东亚圣战”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而竭尽全力。为此，井上把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的古学派，定位为“儒学日本化”的产物；又将被遗忘的山鹿素行评价为日本古学派的首创者和“武士道集大成者”，更索性名之为“武士道学派”。这样，武士道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日本精神“独特性”的代名词。

然而，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唐博士的新著作作出了探索性的回答。该著以山鹿的原著为分析对象，采用了文本考据的实证方法，重新客观地把握江户时代武士道的实态。在研究视角上，与目前学界一般是把武士道与兵学分割开来进行研究不同，唐博士认为：江户时代武士道其实是作为近世兵学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近世日本兵学正是借助儒学理念来修正日本旧有的兵学；因此，厘清江户初期武士道论确立的前提，在于弄清楚儒学在近世日本的传播，这样才有可能说明两者之间的历史关联。

山鹿素行身兼儒学者和兵学者的双重身份，又是在中国明清更替之后倡导“日本中华论”的先驱，对其论说展开研究，有助于揭破井上等一系列学者的片缪，还山鹿学说的真相。应该说，这是该著最大的学术贡献。如同该著第一章所述，山鹿素行通过批判中国朱子学中体认超越之“理”的主张，把认知天地大道的权力归于圣人，然后又通过独占“道统”甚至自负为“圣人”而自我授予解释圣人之道的特权，由此而开创了适应17世纪幕藩体制稳定化需要的古学。以此新的儒学解释体系为理论基础，素行终于建立了山鹿流兵学，而武士道论正是其兵学的核心内容之一。

现有研究倾向于把武士道理解为人伦道德准绳，重视山鹿素行为和平安时代武士的生存意义提供论证的侧面。然而，近世武士道论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山鹿首先是集政治伦理、统治技术和军事技术于一体的兵学者，武士道论仅为其兵学的一部分。一般而言，封建武士兼具上司的奴仆与下属的主人等双重身份。适应这种特殊身份，山鹿素行所构建的武士道论也具有双重意义：既强调精英主义的独立性，也强化依附性的服从精神。

武士道论作为近世兵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和平时期是维护统治体制的道德规范，在战争时期则是煽动武勇狠斗精神的思想工具。山鹿素行的武士道论和吉田松阴的武士道论，分别为适应这两种需要的武士道论的典型论说。从山鹿素行到吉田松阴的思想演变，构成该著书第二和第三章的分析主题。作者认为，山鹿的武士道论为吉田提供了思想线索，吉田的武士道论及其实践，则是山鹿学说在幕末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两者的互动关系框架就是如此。以松阴为代表的倒幕维新的志士们，身处内忧外患一时俱来的激荡时代，为救亡图存，一方面突出武士道论的精英主义内核，力图把握日本之舟走向近代化的舵轮；另一方面也将武士道论的道德教化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将中下级武士反体制的行动严格划定在“君臣大义”的范围之内。这样，就为明治维新时期，改造和活用近世武士道论而未雨绸缪。正是吉田的门生山县有朋等，通过发布并贯彻《读法》、《军人训诫》、《军人敕諭》等一系列体现近代武士道精神的文告，抑制了其精英主义的独立性，而强化其“忠君爱国”，甚至“灭私奉公”的服从性，从而成为近代天皇制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石。

在江户时代，商品经济对旧体制的瓦解与欧美列强的冲击，构成日本走向近代社会的两大驱动力。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东方国家，在跨入近代门槛之初，都或多或少地具备上述驱动力。但是，对西方冲击的反应却存在明显的差异，走向近代化的进程和结果也千差万别。造成这种“同途殊归”历史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这些东方国家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旧经济制度分化程度、精英力量构成的不同，等等。

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社会精英以实力应对挑战的学识基础和心理状态。在那个弱肉强食、武力决定结果的强权扩张时代，由一群职业军人武士构成的日本精英势力，自然比中国和朝鲜的文人更能直截了当地感悟西力东渐的真谛，比因循守旧的士大夫更能采取迅捷而果断的行动。武士精英势力之所以具有认知和行动上的优势，均与武士道论深入其灵魂并体现于行动不无关联。该著所列举的山鹿、吉田的武士道论，足以成为探求近代化转型时期日本社会精英势力的传统学问基础、兵学的继承和发展、近世武士道复杂的秩序功能乃至理解日本社会传统社会精英势力应对西方挑战时的主体意识等一系列问题的入口。

是为序

宋成有 于北京海淀蓝旗营

2010年5月31日

前 言

前近代的东亚主要国家，在中华文化的影响之下，一般都以礼教文治为先，只有日本是由武士长期掌握统治权力。而近代以来，当东亚诸国遭遇西方的冲击之际，推动日本迅速完成传统社会的近代化转型过程的，也正是出身于武士或者前武士的指导者集团。随着近代日本的迅速崛起，武士道研究自 19 世纪 90 年代以来，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武士道被视为日本伦理精神的重要代表，无论是对推进日本近代化的精神因素的探讨，还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批判性研究，甚至对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保守主义政治的长期延续、新民族主义的广泛兴起等问题的解释，都离不开对武士道的研究。

就武士道与日本近代化的关系而言，日本学者以其先天优势而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主导力量。继新渡户稻造，尤其是井上哲次郎等开创武士道研究以来，经和辻哲郎、丸山真男、相良亨等众多学者的发展，当今学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武士道在日本近代化的启动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这种形成于前近代的传统究竟有着怎样的发展演变过程和历史特点？它为什么能够成为一种推动日本社会由前近代向近代迅速转型的精神力量？又如何影响了近代日本甚至现代日本的发展？对此类基本问题的回答依然莫衷一是。

战前的日本学者在皇国史观的影响之下，一般高度评价武士道传统中的尊皇主义（尊奉天皇）、忠君爱国、灭私奉公等精神因素为日本近代转型与发展的关键。此类观点在战后遭到进步学者的普遍摒弃。日本战败以来，长期主导着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是著名政治思想史家和政治学家丸山真男。其名著《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写作于日本法西斯主义侵略战争时期。为了与当时日本学界美化本国传统的潮流相对抗，丸山致力于证明日本并不存在所谓从古至今、一成不变的固有传统，重在凸显日本近世（从16、17世纪之交到1867年德川幕府统治结束）思想界发展变化的侧面，即其所谓“近代性思维”的孕育和发展，力求“从思想史的侧面确证德川封建体制崩溃的必然性”^①。具体到武士道研究这一课题，丸山主要通过吉田松阴的研究，强烈地影响了学术界之后的研究取向。吉田松阴是日本幕末时期武士道精神的著名代表人物，在近代日本被奉为国民楷模，在战后日本依然享有广泛的尊敬。丸山通过分析其“尊王攘夷”（尊奉天皇，排斥外国人）思想的发展、忠诚观念的变化等，探讨了他在日本近代转型时期的思想史意义。丸山真男的学术理念，被植手通有、藤田省三、平石直昭、松本三之介、田原嗣郎、本乡隆盛、尾藤正英等优秀的学者所继承发展，或反思批判。

然而，学界的主流却渐渐倾向于把日本近世社会中的近代性因素，直接与日本的近代化发展相联系。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和日本的经济复兴为背景，在美国学者赖肖尔等的倡导之下，“近代化理论”（或称“现代化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日本研究。前近代的日本被视为日本迅速实现近代化的“历史前提”，得到了高度评价。美国学者贝拉的《德川宗教》一书，便积极评价武士道传统对日本近代化的意义。近代化论者对于日本历史的乐观主义估计，逐渐遮蔽了丸山真男所开创的思想史研究中的近代主义取向。丸山对近世思想中近代性因素的发掘，本来是服务于对封建社会的启蒙主义批判的，后来却被广泛理解为

^① [日]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5页，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

近世日本曾有高度发展的证据。于是，在近代性发展的主题下，在近世形成的武士道传统也得到了日趋积极的评价。与此同时，随着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与战前皇国史观不无联系的怀旧主义在关于武士道的研究和著述中也日渐流行。在此背景之下，科学的批判精神在日本武士道研究领域渐趋淡薄。

回顾迄今为止的武士道研究史可以发现^①，日本作为近代亚洲第一个甚至是唯一一个成功地实现了近代化的国家，这一历史事实构成了多数研究者共通的思考前提。如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一书的问题意识便是：“从思想史的侧面探求，何以……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而成为东方唯一的而且是最初的近代国家。”^②然而，时至今日，这一预设前提自身是否还像当初那样不言自明呢？

以日本战败投降为契机，丸山真男、竹内好等学者曾经尝试对此前提进行质疑。例如，以新中国的诞生为背景，丸山在1952年写道，包括自己在内的战前日本学者普遍相信“中国的停滞性和日本的相对的进步性”，然而，“在经验过所谓‘近代’的日本，和没有这种成功经验的中国之间，就大众基础上的近代化这一点而言，如今正发生着逆转性的对比。”在以上反省的基础上，丸山承认自己写作于战前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陷入了机械片面的观点，认为正统意识形态的解体过程，反过来便是近代意识形态的成熟”。^③

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复兴和发展，近代化论迅速流行开来，上述质疑和反省并未引起多少反响。而丸山自己也于20世纪60年代之后提出“武士气质”论，高度评价幕末志士因再现早期武士精神而来的行动力，并深深惋惜福泽谕吉以这种武士气质作为日本立国基础的期待的落空。尽管丸山有意识地把这种“武士气质”和明治时代的“武士道”区别开来，

^① 关于近世武士道研究史的详细介绍，请参见拙稿《近世武士道研究在日本——日本历史特殊性与连续性的探求》，见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学》第13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② [日]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7页，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

^③ 同上书，7、8页。

却不免加剧了高度评价日本武士道传统的倾向，似乎前近代的日本就已形成了近代性思想。这样的研究思路往往立足于以下前提：凡是有助于近代日本发展的思想，便是具有近代性的思想。虽然日本帝国的战败崩溃，使人们充分认识到近代日本并非典型意义上的近代国家，但日本在“二战”后又创造了令人炫目的经济奇迹，再度挽回了其作为“近代化样板”的声誉。尽管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法免除政治和道德上的批判，但是在重视经济和技术指标的近代化理论的支撑下，日本依然被看做亚洲最具吸引力的成功典范。

然而，中国经济近年来的持续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认识到有必要重提丸山真男、竹内好等曾经发出的质疑。尽管在今日谈论中国的崛起依然不免带有一定的预言性质，但是敏锐的研究者已经开始认识到，即使仅就近代化发展的侧面而言，“日本特有的=近代日本的=近代的”这一图示也过于简单。基于“有利于近代日本形成的因素便具有近代性”的假设前提，致力于发掘日本历史中的特殊因素，并直接运用于对有关日本近代化问题的解释，这样的研究思路已渐丧失其曾有的说服力。为了继承和发扬武士道研究中的批判精神和求真愿望，本书希望能够首先回到问题的原点，搞清楚所谓“武士道传统”究竟是什么，有着怎样的历史功能。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通过建立义务教育体系、加强军队教育、利用在乡军人控制民众以及充分利用近代媒体和出版业的宣传力量，使武士道精神保持了极其强大的影响力和广泛的渗透力。日本在“二战”时期从未发生任何一场真正的反体制叛乱，甚至连这种企图都不曾发现，在战后也比较缺乏主动的反省。日本在战前所构建的关于武士道的基本观点，直至今日依然保持其影响力，为日本政治保守主义的延续和新民族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支持。近年来，日本出版界又再度兴起武士道热。为了促进中日关系发展的健康发展，我们愈发有必要重新思考这一问题。

一、幕藩制度下武士道的秩序功能

在描述日本幕末时期的体制性危机时，“内忧外患”是个常用词。“外患”以1853年美国海军提督佩理率领四艘军舰到达日本为标志而开始显著起来，西方列强以武力威胁日本打开国门，幕府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外交困境。另一方面，自成效甚微的天保改革^①以来，日本国内统治也已渐渐呈现动摇之态。“内忧”与“外患”相互激荡，政局愈发不安。“锁国”是德川时代幕藩体制的根本制度之一，幕府垄断对外贸易和海外情报，禁止日本人出海，限制外国人到日本，这标志着对权力和权威的全面独占，同时也意味着对维持秩序稳定的政治承诺。当幕府迫于西方列强的军事压力而打开国门的时候，在当时的许多武士看来，这是幕府的失职，直接导致幕府权威的失坠。力图扭转幕府政策的所谓“志士”，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拉开了时代变革的序幕，由此开启了日本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道路。究竟是怎样的伦理观念支撑着幕末志士们承担起政治变革的任务？为求深入理解这一问题，本书计划选择著名的志士吉田松阴作为代表性案例进行分析。

吉田松阴是出身于长州藩的兵学家，其思想探索为倒幕维新志士们提供了重要的指导。自明治时代（1868—1912）以来他便是公认的作为日本近代转型起点的倒幕维新运动的先驱者。野村靖赞美吉田松阴说：“我长州藩士，盖出于先生之门，而诸藩之士，亦莫非闻先生之风而起者。……明治中兴之基，盖先师之力居多焉。”^②野村素介强调吉田松阴对倒幕的作用，说：“其言论行事，既已耸动天下之心，志士仁人接踵并起，盖先生死，而德川氏亦替。”^③德富苏峰更盛赞吉田松阴所主导的“松下村塾是孵化颠覆德川政府之卵的温室之一，是点燃维新革命天火的圣坛之一”。并

^① 天保是仁孝天皇的年号，1830—1844年。所谓天保改革，指天保十二到十四年，老中水野忠邦主持的幕府政治改革。

^② 《吉田松阴全集（第四卷）》，377页。

^③ 同上书，379页。

引用伊藤博文的话来强调其对明治维新影响力之大：“如今庙堂栋梁器，多是松门受教人。”^① 松阴门下涌现了久坂玄瑞、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作为在日本近代化转型期处于主导地位的这一支政治力量的思想先驱和精神导师，吉田松阴长期以来广为学界所重视，已经积累了数量庞大的研究成果。

但是，关于松阴精神渊源之所自，目前的学术界却未能取得统一见解。松阴自幼继承的家学是由山鹿素行（1622—1685）所创立的“山鹿流兵学”。素行依据儒家思想改造日本传统兵学，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武士道论，此乃“山鹿流兵学”最具特色的核心内容之一。吉田松阴武士道论的代表作品《武教小学讲录》即其讲解素行武士道论代表作《武教小学》的笔记。着眼于此学派背景，在日本战败之前曾经形成一个通说：山鹿素行是江户时代武士道论的集大成者，吉田松阴继承了山鹿素行的教导，并通过教育松下村塾的子弟而传续到明治时代，构成了近代日本迅速发展的精神因素。^② 德富苏峰也以山鹿素行所著《配所残笔》为据，来论证吉田松阴的国体论、国力膨胀论、士道论以及贯穿这一切的皇室中心主义，其渊源在于山鹿素行。德富评价道：“素行论之，吉田松阴施之；素行唱之，吉田松阴扩之。”虽然时势不同，人格有异，但吉田松阴是山鹿素行的“有力的继承人”。^③ 总之，吉田松阴被认为和山鹿素行在思想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似乎有一种同质的精神超越了历史的限制，贯穿着相隔一个半世纪之久的两个人。

这种将松阴对素行的武士道论视为一种单纯的继承关系的观点，在“二战”后渐被质疑和批判。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是：山鹿素行的学问包

① [日] 德富苏峰：《吉田松阴》，159～160页，东京，岩波书店，1981。

② 井上哲次郎在《新订国民道德论》第6章《武士道的历史、特质以及将来》中，把武士道的发展分成三期，其中第三期是德川时代。（[日] 井上哲次郎：《新修国民道德概论》，169～170页，东京，三省堂，1928）

③ [日] 德富苏峰：《吉田松阴》，改订第10版，397～403页，东京，民友社出版部，1909。

括其武士道论，是为幕藩制度稳定化服务的学说，^①那么，为何其后学吉田松阴却发展成为促使幕藩制度解体的先驱者？战前那种简单地强调武士道精神或尊皇精神的发扬之类的解释方式，已经不再有说服力。战后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两种解释途径。第一种途径是在山鹿素行之外寻找松阴精神的其他渊源。

在日本近世，与山鹿素行所代表的深受儒学影响的居于主流的武士道论（亦称士道论）相对，还存在一种以山本常朝的《叶隐》为代表的、体现了武士传统作风的武士道论。着眼于此，丸山真男提出：山鹿素行的武士道论适应了近世日本家产官僚制的发展；《叶隐》则是在幕藩制下的和平环境之中，对战国时代武士作风的意识形态总结；幕末的政治动荡使得以松阴为代表的志士们部分复活了《叶隐》所代表的传统武士精神。^②丸山写道：“在吉田松阴那种典型的‘忘我’忠诚和主体性中，在他那绝对的归依感情和强烈的实践性的对立统一中，明显地贯穿了《叶隐》里的传统意识。”^③这一敏锐的洞见广泛地影响了后来的研究者。

但是，松阴和《叶隐》的武士道论也存在着非常尖锐的对立，例如关于武士道的核心问题生死观，《叶隐》主张：“所谓武士道，就是死。面临

① 学界基本上一致认为山鹿素行的学问动机是为幕藩体制辩护，区别主要在于如何理解其思想逻辑和实际影响力。如和辻哲郎比较井原西鹤的《武道传来记》和《武家义理物语》之中所描述的武士伦理的区别，认为前者描写的大多是武士们为了些许口角就杀人的悲剧，体现了为名不惜舍命的《曾我物语》和《义经记》的传统，而后者变成了强调“不为情爱所囚的纯粹的义理”的贯彻，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三、四十年间，中江藤树、熊泽蕃山、山鹿素行等学者逐渐提倡的关于士道的新思想，在接近元禄的时候，风靡世间。（〔日〕和辻哲郎：《武士道》，见《岩波讲座伦理学20》，10~11页，东京，岩波书店，1941）相良亨也认为：儒教是近世思想的主流，以山鹿素行为代表的士道也是近世武士道的主流。（〔日〕相良亨：《近世士道论》，见相良亨等编：《日本思想史的基础知识》，东京，有斐阁，1974）中国学者一般也认为山鹿素行的士道论是符合江户时代意识形态需要的伦理规则。（参见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王家骅：《神儒佛与武士道》，见叶渭渠主编：《日本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等）

② 参见〔日〕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讲义录（第五册）》，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忠诚与反逆：转换期日本的精神史的位相》，东京，筑摩书房，1992。

③ 〔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116页，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

生死选择之际，唯速求死而已。”^①而松阴主张：“私欲私心全无者，偷生不妨。有死而不朽之预见，可死；有生成大业之预见，可生。”^②甚至教育弟子道：“虽高节如天祥，可偷生则偷生。”^③两者的差异如此明显，以至于和辻哲郎、相良亨等均将其分别归入两种不同的类型。^④更重要的是，《叶隐》在近代以前基本上只限于在佐贺藩士这样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内流传，并无可靠史料显示吉田松阴曾经受到过《叶隐》的影响。那么，所谓传统武士精神究竟是通过怎样的学说传承而得以在吉田松阴身上复活？对此必须进行历史学的、文献学的考察。

自然而然的推论是：松阴在某种程度上改造了素行的学说，从而把维护幕藩制的伦理学说转变为破坏幕藩制的精神指导。立足于这一认识前提，形成了在“二战”后学术界被广泛运用的另一条研究途径：重视分析幕末时期西方的冲击带给松阴的影响，着重分析外来刺激如何引发了松阴对素行学说的改造，尤其是强调西洋兵学对松阴思想发展的影响，却鲜有

① [日] 斋木一马等编：《日本思想大系 26 三河物語 葉隠》，220 页，东京，岩波书店，1974。

② 《吉田松陰全集（第六卷）》，362 页。

③ 《吉田松陰全集（第十卷）》，477 页。

④ 关于武士道有两种类型的观点最早是由和辻哲郎提出来的，他在承认井上哲次郎所建立的“素行—松阴—明治”的系谱的基础上，另外建立了“镰仓—战国—叶隐—昭和”的系谱。在和辻哲郎看来，松阴的武士道也是儒学的士道，不同于《叶隐》所代表的“古风的武士道”或“献身道德的传统”。另，相良亨继承了和辻哲郎的基本分析框架，但是在具体代表人物的归类上略有不同。参见 [日] 相良亨：《武士道》，东京，塙书房，1968；[日] 相良亨等编：《日本思想史の基础知识》，第 25 章；等。